



练暑生 著

现代之后： 历史与纯文学的游牧

南帆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刘小新 主编





现代之后： 历史与纯文学的游牧

练暑生 著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之后：历史与纯文学的游牧 / 练暑生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5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南帆, 刘小新主编)

ISBN 978-7-5550-0658-9

I. ①现… II. ①练…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5838 号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为 2015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现代之后：历史与纯文学的游牧

练暑生 著

责任编辑 朱墨山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658-9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 南帆

“闽派批评”的称谓一度流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闽籍批评家同时跻身于文坛，登高而呼，雄辩滔滔，许多重大命题的确立隐含了他们的思想贡献。强烈的理论兴趣无形中造就了一个醒目的群体，“闽派批评”即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文学史上许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划或者深思熟虑的产物，相当一部分美学潮流或者学术派别的命名是由于不无偶然的历史机缘，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朦胧诗”，或者“形式主义学派”“达达主义”“耶鲁四君子”，如此等等。“闽派批评”之称并非来自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这个命名毋宁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闽籍批评家的人数明显超过了各个省份的平均数。

可以列举的闽籍批评家名单洋洋大观。一部分批评家长期身在京沪，例如谢冕、张炯、刘再复、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张陵、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等等。他们多半是年轻时外出求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京沪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批评家长期活跃在闽地，例如孙绍振、许怀中、刘登翰、林兴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杨健民、谭华孚、南帆等等。个别批评家的活动轨迹相对复杂。陈晓明当年已经在闽地崭露头角，继而求学、定居

北京；谢有顺求学于闽地，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栖身于粤地。

如此多元的成长背景显明，闽籍批评家并未承传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闽派批评”并非一个彼此师承或者同声相应的学派。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到主体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闽籍批评家活动在跨度巨大的理论场域，分别充当不同主题的领衔主角，譬如谢冕、孙绍振之于新诗论争，刘再复之于文学主体性，陈晓明之于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总之，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他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解放的叙事逐渐成为主旋律。作为解放叙事的先锋，文学承担了摧枯拉朽的使命。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扩大战果，开拓理论纵深。闽籍批评家接手的第一个理论战役是“朦胧诗”之争。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开始集结。他们的诗作充满了象征、意象和反讽，情绪忧郁、悲愤、孤寂，音调嘶哑。八十年代初期，这些诗作陆续出现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

语，也是“朦胧诗”之称的来源。这些诗人的中坚之一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福建文学》率先发起争论。一时之间，应者云集，诸多批评家见仁见智，蔚为大观。这一场争论成为许多闽籍批评家的发轫之处。

《福建文学》策动的论争延续到一九八〇年的“南宁诗会”，掀起了一次新的波澜。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勇敢地为“朦胧诗”辩护，张炯担任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会议之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继而又在《诗刊》刊登《失去平静之后》。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的论文标题即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时至如今，“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

奉为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标榜科学精神。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与数学的统一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闽籍批评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这种观点是文学对于主体哲学的致敬。刘再复分别阐述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尽管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概念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主体性命题，但是，多数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于这个命题背后的苦心：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闽籍批评家的理论工作显示了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众多闽籍批评家的知识谱系相距甚远，可是，他们不约地围绕相近的问题持续地思考，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迫切性。

“闽派批评”的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年，王蒙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籍贯、地域文化渊源、历史机遇——“闽派批评”命名的依据显然是三种因素的相加，尽管三者的意义并不相等。然而，这个命名之所以普遍流行，显然得益于几次影响广泛的批评实践。没有批评实践的支持，种种人为的舆论吹嘘走不了多远。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福建省文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为“闽派批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

重要论文。因此，谈论“闽派批评”的组成范围，通常会提到《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副主编王炳根、林建法、林焱和编辑王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闽派批评”之称逐渐淡隐。当然，这不等于闽籍批评家销声匿迹。一些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骥伏枥，他们仍然密切注视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九十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朱双一、刘小新、朱立立和袁勇麟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闽籍批评家正在迅速地成熟……相对于闽籍批评家二十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我企图借助这些描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资源，是否到了重提“闽派批评”的时候了？

重提“闽派批评”，制造乡贤的学术聚会或者地域文化表彰仅仅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发现新型的话语平台，召回曾经活跃的批评精神。闽籍批评家是不是可以如同当年一般犀利骁勇，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文学话题，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很大程度上，这同时是

文化环境的迫切要求。

现今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正在滑向边缘。娱乐新闻、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节目占据了大部分传媒的版面；许多人的心目中，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范本。与此同时，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急剧下降，“严肃”正在某些人心目中演变为令人厌倦的品质。这时，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将在这个时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来愈多的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二十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繁盛的理论生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种考察文学、考察世界的视角。批评家可以发现各种文学话题，还可以借助文学话题阐述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闽派批评”的历史证明，由于批评家不懈的呐喊、辩驳、阐发和倡导，某些显赫一时的声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学批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果说，“闽派批评”的称谓曾经贮存了丰盛的文学记忆，那么，许多闽籍批评家即将开始面对另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称谓如何内在地织入文学的未来？

新生代批评家的加盟，即是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唯有新生力量的持续涌现并且不断发出独特的声音，“闽派批评”才能真正重新出发，发扬光大。新生代批评家大多具有严谨的学术训练，理论视野开阔，他们代表了“闽派批评”的未来。编辑出版“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即是集中展示这些新生代批评家的实力与个性，注释“闽派批评”这个称谓的崭新内涵。

是为序。

（南帆，本名张帆，现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目 录

第一辑 现代之后：历史与文学性

形式、历史和在话语中想象	(3)
文学的能量：日常生活与乌托邦	(8)
关系与结构：抑或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性	(19)
“纯文学”的文学史如何可能	(25)
个人主义：作为“革命文学”话语之外的边缘接合	(36)
感性的政治：必须保卫日常生活	(48)

第二辑 民族国家与文学史写作

民族国家以及被征用的“乡村”	(55)
世界与精神分裂的现代派	(63)
阶级论与 20 世纪 80 年代“农民”的出现	(72)
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传统 ——在历史的旋涡中展开想象	(82)

第三辑 想象历史的幽灵

话语分析和底层问题	(89)
《诗经》中的底层文学表述问题	(93)
阶级、个人和底层想象的维度	(98)

革命叙述：乌托邦，还是意识形态 (105)

第四辑 城市、中产阶级，还有欲望

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的颓废和城市 (115)

如何想象上海

——三部文本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怀旧叙事 (124)

知识分子与现代文学解释学 (140)

直面华人世界的现代创伤记忆 (151)

第五辑 后革命的想象空间

后革命的剩余 (159)

文类与经验的双重解放 (167)

阅读中产阶级的贫困 (174)

后革命时代的想象空间 (181)

附录一

寻求消费时代的文学性

——练暑生学术研究的聚焦点 成业 (186)

练暑生学术简表 (190)

附录二

词汇与想象当代的勇气 (192)

后记 (195)

第一辑 现代之后：历史与文学性

形式、历史和在话语中想象

南帆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于近日出版。这部著作以全新的观念、体例和思考方式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回应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来人文学科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方面，《文学理论新读本》通过写作和思考方式的全面转换，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尚停留在文学批评阶段、同时也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一系列命题、视角和传统的理论资源辩证地汇入基础理论的写作当中，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写作空间或者说可能性。

作为基础理论著作，《文学理论新读本》首先必须面对文学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最艰难的问题“文学是什么”。它是一种可以从文化语境中抽象出来的自律的文化形式是主体的想象性创造物，还是对历史的再现？50 年代以来的文学基础理论基本上是沿袭着上述路径寻找问题的答案，叶以群先生的《文学基本原理》（1961 年与蔡仪先生《文学概论》合并）和 80 年代翻译的《文学理论》（韦勒克和沃伦）是这一段时期先后出现的两种权威范本，分别代表着反映论和自律论。同时，在 80 年代的启蒙语境中，还活跃着“表现”、“体验”、“无意识”等各种主体化范畴（在 80 年代的特殊语境中，“自律论”也成为人们确立“主体中心”地位的理论资源）。这些概念或理论范式分别占据了特定时期的基础理论或文学批评的主导地位。进入 90 年代以后，它们遭遇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来的各种文学、文化理论的全面冲击。一方面，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去除了“主体的中心”地位，人们认识到想象和创造的根源并不来源于神秘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和各种后现代文化理论



再一次打开了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所构想的封闭的文本空间，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并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语言部落”。同时，由于特定的主体是特定的符号，尤其是语言的空间的存在物，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中介想象和感知事物，因此反映的结果只是经由一系列中介“过滤”的意识表象，这无疑在理论上质疑了反映论中“真实再现”范畴的合法性。正如阿尔都塞及其弟子马歇雷指出的那样：镜子只是意识形态化的镜子。

如果形式、主体和“再现”都无法确保自身的独立性或者说纯洁性，那么人们该如何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理论新读本》没有另辟途径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是首先质疑了这一提问方式的合法性，因为这一问题的背后蕴涵着一个“本质化”的理论目标，企图在存在着无穷差异的无数文本中抽象出某种文学的“一般性”或“普遍性”。这种本质化的文学定义既无情地遮蔽或漠视了文学的无限多样性，同时也无法回答特定形式存在的历史化过程。为了回避本质主义和回应上述各种新的理论、命题的挑战，《文学理论新读本》在“主体与符号”的关系框架之中，把文学描述成“社会话语光谱”中的一种“话语实践”。“话语”作为一种言说实践，其信息传达的可能性及其效果，以及什么形式能够成为有效传达的媒介，都必须由共享的语境担保。《文学理论新读本》因此指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并不是因为它拥有某种本质性的特征，而是“历史之手撮合的结果”。《文学理论新读本》由此拒绝了“文学是什么”这一本质化命题，而是思考“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为什么要将一批文本确定为文学——谁有权力这么做”。基于对文学的这种历史相对性的认识，《文学理论新读本》把文学描述成“话语实践”，并不是给出了一种界定性的定义，而是提供了一座分析路标，它引导出一套“文学问题的菜单”：在特定的时代，哪些文本被称为文学？它包含着哪些功能性元素？什么力量把一些文本和元素归入“文学”的范畴？文学承担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功能？它如何承担这种功能？

由于提问方式或者说思考方式的转换，《文学理论新读本》对基础理论的体例进行了全面变革。和前者一样，体例的变革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整个理论视阈和文学观念的全面革新。《文学基本原理》（以群）、《文学理论》（韦勒克和沃伦）这两种权威文本的体例安排方式是建立在写作者的知识观和文学观的基础之上。《文学基本原理》首先在人类知识总体中指出文学所在的位置，然后在对文学进行总体性把握的基础之上，对文学的性质、特征等

一些构成性问题进行分节把握。这种思考和写作方式，背后包含着黑格尔式普遍化的知识信念和主观直接反映的认识论。而《文学理论》则按照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安排章节，与其本质主义知识论和形式自律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为了回应历史相对化的知识观和文学观，《文学理论新读本》从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这一分析路标所引导出的“文学问题菜单”出发，安排了四个部分讨论问题：第一部分讨论了再现、符号、文本、文类和修辞等文学的构成性问题；第二部分探讨了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些重要范畴，诸如经典、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概念；第三部分则论述了包括文学与意识形态、历史、社会、道德、思想和性别的复杂关系；最后一部分则对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对相对化语境中文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展开了积极的理论思考，同时还对当前文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诸如“文化研究”，作出了回应。

在主体与符号的关系中得到贯彻的历史相对性文学认识，贯穿了四个部分。因此，第一部分的“文学的构成”不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文学“内部”，这些元素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构成是由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空间所担保。如关于文类问题，《文学理论新读本》指出：“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类系统是同该语境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同样，文学修辞也不是纯粹技术性问题，主体在进行诸如叙述视角和词汇的选择过程，人们在其表达效果的背后可以发现意识形态所起到的隐蔽作用。第一部分是在由语境所确认的“内部”讨论问题，第三部分则转换视角，以“形式意识形态”概念为中介，从“社会话语扇形光谱”这一大文化视角，讨论了文学话语和其他话语实践的复杂关系。如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理论新读本》指出：文学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单向感受器，文学的虚构或者说陌生化的特征（什么是虚构和陌生也是由语境支持的），使文学具有“两面性”：既支持意识形态，同时也可能挑战或修正意识形态。为了贯彻文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的文学观，《文学理论新读本》第二部分“历史与理论”把人类文学史出现的一些重要范畴作为历史范畴来讨论。如《文学理论新读本》认为“经典”作为特定时代的创作范例，并不占据所谓永恒的地位，无论是文学机构还是特定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始终作用于经典的“遴选和变迁”过程。同样，自古典主义以来先后产生的创作手法（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不能成为跨时空规范创作或对文学



作品进行归类的形而上范畴，作为语境的产物，它们只能保留在历史性的框架中。如现实主义手法的产生与 18、19 世纪的知识论、古典的模仿论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并随着这些关系的变化而失去其曾具有的文学和历史功能。

在《文学理论新读本》中，某些曾被视为失去了理论生命力的命题和范畴，它们的理论意义得到了有限的恢复。如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学理论新读本》首先承认了文学对现实的再现或认识作用，但是主体的再现和认识“无法脱离特定符号的活动和形形色色的符号文本”。在这一理论表述中，再现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包括新批评的自律化形式，不但恢复了部分的理论意义，同时还获得了一个可以共存的写作空间。这种共存和恢复不是简单的折中，《文学理论新读本》全新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保证了这种“共存和恢复”的合法性。由于是从语境提供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本质化的理论原点出发进行写作，在问题的提出和解答过程中，《文学理论新读本》穿越了自律论和他律论，因而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命题和范畴获得了被辩证思考的可能性。这在理论上同时也回应了某种“焦虑”：如果文学必须向语境开放，那么文学是否会成为“各种文献资料的汇编”？《文学理论新读本》反复提醒：文学并不是“庸俗社会学”式的对历史的直接记录，而是经历了各种形式的中介，因此意识形态解读必须经历从形式到意识形态的曲折旅行（在这种解读之旅中，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社会学批评等理论范式获得了其相应的有效性）。由于写作和思考方式的变革，使《文学理论新读本》能够对结构主义以来人文科学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及时和有效的回应。这种“回应”不只是在基础理论中增加一些新问题、新概念，而是让它们和既有的理论一道，在文学“问题菜单”中碰撞、梳理和承续。如关于文学与种族问题，《文学理论新读本》从丹纳一直旅行到萨义德；再如在文学与地域的关系问题上，从斯达尔夫人一直前行到杰姆逊等人的“全球/地方”关系理论，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不但指出了他们的理论的有效性范围，同时也对他们之间的延续性和差异性进行了积极思考。

如果文学是历史相对性的存在，那么在这种相对化语境中该如何研究文学？如果研究转向了以读者接受为中心，那么专业化的研究还有何必要？该如何解答“过度阐释”问题？《文学理论新读本》第四部分首先回顾了文学研究以作家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以作品为中心和以读者为中心的几次重大转